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By PETER C. PERDU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xx, 725 pp.**

《中國西征：清朝對歐亞大陸腹地的征服》是濮德培（Peter C. Perdue）今年四月出版的關於明清中國西北邊疆發展史的一部力作。與既往研究不同的是，作者反對從民族國家本位主義出發來看待清王朝、俄國、蒙古在歐亞大陸中部地區的三方角力。他將清王朝、俄國、蒙古置於平等的位置上，在三者的互動關係中，解讀清帝國在歐亞大陸中部地區疆域拓展的歷史進程。然後作者將筆鋒轉至清代、民國直至現在，分析社會精英利用文字等媒介對這一歷史事件所進行的話語建構過程。作者對上述內容的闡釋其用意是在「全球化」的視野下，從中國歷史發展的自身理路來回答近代中國民族國家何以形成的問題，進而與西方歷史的發展進程形成比較。有別於以往中西比較研究，作者認為應重視國家行為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制約作用。因此，在行文中，國家安全與戰略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是作者一再強調的重中之重。

本書除引言外，共分五部份。第一部份包括三章內容，主要圍繞歐亞大陸國家的形成展開。在這一部份，作者首先對歐亞大陸中部的自然環境進行了描述。他反對研究者帶着政治上的先入為主的偏見和種族優劣論對自然環境進行比較研究，他認為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用地理環境的差異來為西方優於東方提供佐證。在作者看來如果研究者能夠放棄成見，真正體察人類與周邊環境的微妙關係，那麼許多問題都可以重新解釋。立足於這個觀點，作者指出歐亞大陸生態環境從東到西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這使得該地呈現出疆界和文化的模糊和不確定的顯著特徵，同時也使得人們可以在這裡任意遷徙，自由來去。既定的地理環境，無形中約束着人類的全部行為。易於移動的地理形勢，適合游牧人羣的生存，但環境的同質性也限制了他們的進一步發展；而對於明清帝國的締造者們來說，如何有效地適應這種環境與活躍在這裡的游牧人羣展開斡旋，也就成爲在競爭中獲勝的關鍵。在這裡作者特別介紹了當時最主要的作戰和運輸工具——馬在人們交往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結合後文，我們可以發現，在人類交往方式未變的情況下，馬政得失於明清對蒙政策的成敗具有極爲特殊意義。接下來，作者主要對15至17世紀末近二百年間的明蒙關係、俄羅斯帝國、準噶爾汗國的形成、滿洲的崛起以及他們的早期接觸進行了論述。

第二部份包括四章，主要圍繞歐亞大陸中部的權力競爭展開。在這裡作者反對單方面地探討中俄關係、俄蒙關係或中蒙關係，他強調應在清帝國、俄羅斯、蒙古三方交錯的利益關係中分析歐亞大陸中部的局勢。他認為由於清帝國和俄羅斯存在一致的經濟利益，因此在對外關係上俄羅斯最終導向了清帝國。1689年《尼布楚條約》和1727年《恰克圖貿易條約》的簽訂，使清帝國和俄羅斯達成某種程度的默契，這決定性地影響了歐亞大陸中部地區的權力格局。雙方關係的和解對準噶爾蒙古來說是沉重的一擊。這使他們不可能向俄國尋求結盟關係；不只如此，俄羅斯對清廷西征的默許態度也為準噶爾汗國的最終失敗埋下了伏筆。與周邊蒙古的良好關係，不僅使清帝國諳熟草原帝國的政治軍事邏輯，也使得他們在戰時得到了蒙古同盟的有力支持。而隨着準噶爾汗國不斷壯大，對清帝國的侵擾不斷，構成帝國安全的巨大威脅，戰爭已在所難免。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以準噶爾及其後繼勢力的最終潰敗以及清帝國的全面勝利收場。在雙方的交戰中，作者一再強調了在歐亞大陸中部廣袤的土地上後勤保障對軍事戰爭的重要性。作者認為與前代比起來，清帝國之所以能夠取得前所未有的勝利，主要就是因為他們通過種種舉措有效地解決了糧餉、軍馬、武器等一系列的後勤補給問題。

第三部份分為四章，主要論及帝國的經濟基礎。在這一部份作者指出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新疆地區由游牧發展到定居經濟的至關重要的轉變過程。像清帝國在西北作戰飽受後勤補給不足的困擾一樣，準噶爾汗國同樣在這方面受到限制。因此在清帝國不斷向西北滲透之時，他們也在通過建立城市、發展農業、培植商業等各種手段來加強自己的經濟基礎。但不應把這一轉變簡單視為是被定居社會同化的過程，它實際上體現了準噶爾汗國動員各種資源，加強防禦的需要。接下來的內容主要涉及清帝國對新疆的經略。作者論述了新疆的屯田、土地清理、糧食倉儲、災荒救濟、商業貨幣等問題。但他並沒有把目光停留在對這些現象的敘述，而是進一步分析了清政府經營西北的真正動因，他指出如果我們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就會發現其實並不像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清廷是懷抱着發展西北經濟的目的而進行上述努力的。在清政府看來，經營新疆始終是一單明知折本卻不得不做的生意。朝廷的動機十分簡單，就是使新疆在經濟上能夠自給，不再仰賴內地，而最終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帝國的安全。作者以為舉凡清代新疆的所有問題，都應在這個大前提下加以考慮。

第四部份有兩章，主要圍繞着中央王朝固定疆界的努力而展開。中央王朝在空間和時間兩個方面對疆界進行固定的努力。在空間方面，作者首先指

出像西歐各國、俄羅斯和土耳其帝國一樣，17、18世紀，中國同樣發生了一個限制人口流動、明確空間界限、以及與周邊國家談判建立疆界的過程。接着書中主要考察了遊歷、碑刻、地圖這幾種被統治者慣常採用的技術手段，作者認為這幾種技術手段在劃定疆界、彰顯權力的同時也製造了帝國的想象。但帝國標識空間和人群的努力，從未真正取得成功，在「平定」的表象下，隱藏着深層的危機。在時間方面，作者主要強調帝國如何通過編撰史書把對邊疆征服的歷史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詮釋；而這樣做的目的其實是爲了證明清王朝是天命所歸，正因爲他是天命所歸才能完成前朝未能完成的豐功偉業。但此種以帝王爲中心的解釋，一廂情願地將西北的戰事定義爲「叛亂」，將帝國的征服定義爲「剿滅」，作者認爲如此這般的做法，有失公允，因此他希望認真比對經過改造和原始的、官方與非官方的、王朝與蒙古的等各方面的史料，盡量能夠使我們傾聽更爲多樣的聲音、看到更爲多元的歷史。作者最後指出王朝的這種努力，雖然從未能夠彌合帝國內部的諸多差異性，但它極大地確立了帝國統治的合法性，並被他的後繼者——民族國家發揚光大。

第五部份的標題是「傳承與意涵」(Legacies and Implication)，這一部份又分爲「書寫民族征服歷史」、「歐洲與亞洲國家的建立」、「從清朝沉浮看邊疆擴張」三章內容。在「書寫民族征服歷史」的章節，作者首先分析了在王朝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龔自珍、魏源這些經世致用之才如何繼續並最終完成了民族征服歷史的書寫，同時指出龔自珍、魏源對邊疆開發、邊疆防禦的關注，顯示了其思想的進步性，但這樣的觀念並不是受西方的影響而產生，而是源自於他們所知道的王朝擴張的經驗。接下來作者指出西方史學家在地緣政治的視野中，也對清帝國疆域的擴張進行關注，而且他們跨越了國家的界限，把準噶爾、俄羅斯、清帝國三國的擴張，作爲是世界歷史發展過程的一個重要事件來看待。然後作者闡釋了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的歷史學者如何在民族主義的情懷下，將中國建構成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他指出蘇聯和蒙古亦採用了同樣的假設，他們把清帝國看成是一個一貫的擴張者，強調其擴張對遊牧民族造成的災難。作者將上述編史方式歸納爲目的論 (teleology)、道德評判 (moral evaluation)、自然邊界 (natural frontiers)、實質化認同 (essentialized identities) 四個特點，並對這四個觀點一一加以駁斥。他指出：應回到歷史的場景中去，盡可能地從當時國家和行動者利益和動機來思考問題，而不是把其視爲民族國家發展的必然階段；應把邊界和族群的認同當成是一個建構的過程來看待；應看到環境對人類的制約作用、給

予物質基礎足夠的重視。

在「歐洲與亞洲國家的建立」這一章節中，作者指出主要由邊疆關係、軍事戰略、後勤補給、外交策略四方面內容組成的清王朝擴張的模式，可以最終回答為何清王朝得以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帝國這個問題。接着作者對基於歐洲經驗研究中國的政治理論以及游牧國家形成理論這兩種史學傳統進行了學理上的爬梳。他贊同直到18世紀中期，歐洲與清帝國並沒有存在巨大差異的觀點，並引用了Charles Tilly有關歐洲國家體系形成的理論，來對中國民族國家形成的模式進行闡釋。Charles Tilly區分了現代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的三種途徑，即資本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 mode）、高壓統治密集型（coercion-intensive mode）和資本化的高壓統治型（capitalized-coercion mode），作者認為Charles Tilly的研究使我們的討論可以轉移到軍事與商業活動的相互作用上來。接着作者試圖彌合「歐亞大陸相似論」和「阿爾泰學派」兩種理論的分歧。作者指出作為近年來清史研究領域新出現的兩種解釋傾向，前者強調明清時期的社會經濟組織與歐洲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如R. Bin Wong、Kenneth Pomeranz等人的研究），而後者則強調清帝國與歐亞大陸中部的關係（如Mark Elliott、Evelyn Rawski等人的研究）。作者認為用軍事後勤（logistics）和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兩方面的內容來入手來研究這段歷史，則可以有效地將二者的觀點結合起來。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從清代沉浮中看邊疆擴張」中，作者指出軍事擴張深刻地影響着清朝內政，使其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最終成就了天朝大國的無上榮光。因此軍事擴張的停止不可避免使清朝喪失了活力之源，這導致了清朝統治基礎的日益削弱。接着作者從1780年代，英國侵略中國南部海岸的事件講起，論述了清廷錯誤地將西北經驗移植到中國南部去運用；作為一個談判的國家（negotiated state），在特定的時期，地方勢力與中央王朝平衡的破壞；國家的商業化與地方化幾個方面的內容，作者認為正是以上四個方面內容導致了19世紀王朝的日漸疲弱。

有關中國西北邊疆研究成果之多，無需筆者贅言，作為同樣一部關心這個問題的論著，筆者以為作者將西北的軍事擴張與清王朝命運的浮沉聯繫起來考察，進而在世界的格局中，重估清代中國歷史，這是與以往的研究最大的不同之處。近年來出現的有關中西比較史學研究著作（如R. Bin Wong、Kenneth Pomeranz等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拓寬了中國明清歷史研究的視野，同樣作為一部比較研究的著作，本書與既往不同的是：作者在書中更加強調了國家行為對各種社會資源的配置作用，他把國家的安全與軍事戰略和

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緊密聯繫起來，強調國家安全與軍事策略在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作者希望在這個基礎上比較中西民族國家形成的不同的歷程。筆者以為這樣的研究視角使我們更具整體感地看到了社會生活的生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側面如何互相激發，推動社會發展至今天我們所見的面貌，在這個意義上，本書是一本能夠啟發我們思考的好書。

本書讀來令人意猶未盡之處是，作者在強調國家行爲的同時，勢必過多地關注邊疆擴張過程中的王朝單向度推進以及王朝如何創制帝國的想象，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那些在經由軍事征服已經納入王朝版籍的地域範圍內生活的人們，比方說作者在文中提到的新疆的伯克勢力，比方說在更為底層的普羅大眾，他們又怎樣表達對帝國的想象？這是作者的研究中關注不夠的地方。筆者以為如能更平衡地把握二者的關係，或許能夠更加深入地回答「帝國何以被想象並維繫」的問題。

田宓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Dislocating China: Reflections on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 By DRU C. GLADNEY. London: Kurst & Company, 2004. xvii, 414 pp.**

在市場經濟轉型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在日益增長，這將會給中國內部和周邊國家帶來怎樣的影響，這是Dru C. Gladney在2004年最新出版的書中試圖探討的問題。作為一位從1980年代初就開始關注中國穆斯林問題的學者，Gladney近年來把研究範圍擴展到土耳其、哈薩克斯坦、埃及等國的穆斯林群體中，嘗試從一個國際化的角度來審視中國境內的民族問題。

該書共有16章，除去導論和結論，分為七個部份（每部分兩章）。第一、二部份介紹當代中國如何塑造中華民族文化認同，例如民族文化公園的建造，以及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尤其是田壯壯的《盜馬賊》。第三、四部份探討中國境內和境外不同的穆斯林群體的認同和塑造過程，包括北京、西北數省和福建沿海地區以及土耳其、哈薩克等地的中國穆斯林移民。第五、六部份集中討論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中國境內的穆斯林在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的環境下，如何處理內部關係和對外關聯。第七部份則把視野轉移到後